

抓住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认识资本主义历史趋势

陈恕祥

认识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趋势，是现实生活向我们提出的十分重要的课题。这里所说的现实，首先是西方资本主义在当代的发展。人们固然可以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自身的发展来解释西方的经济发达，但这毕竟是在仍保留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的。于是，前些年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一百多年前就说“丧钟响了”的资本主义，在西方至今没有灭亡，反而有新的的发展？这实际上表示了对资本主义具有必然灭亡趋势的怀疑。在他们看来，发展和走向灭亡是绝然对立的：说灭亡，就谈不上发展；有发展，就否定了会灭亡。他们更没有这样来认识问题，即发展和必然走向灭亡，统一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

近两三年来，在一些国家，实行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在那里，正发生历史的大倒退。西方资产阶级迫不及待地宣称社会主义已经失败、灭亡，似乎他们的资本主义由此解除了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威胁，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另一方面，这种历史发展长河中的曲折现象，在我们一些对社会发展规律缺少认识的人当中，是容易引起思想困惑的。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必要进一步揭示资本主义根源于其内在固有的矛盾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必然性。

从理论上认识资本主义历史趋势的关键，是要紧紧抓住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这是因为，正如列宁所说：“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结论，马克思是

完全而且仅仅根据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得出的。”^①从根本上说，这个规律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我们看到，凡不是这样来认识问题的人，即使一度相信资本主义会灭亡，其信念也是不牢固的。例如，有的人从人类正义、公平等抽象观念出发，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不合理”因而“应该”灭亡。而在另一种情况下，这种人又很容易接受私有制、资本主义“符合人的本性”之类的欺骗宣传。又例如，有的人过去实际上是把资本主义要灭亡，仅仅归结为这个制度使劳动者陷入贫困。这样，面对西方发达国家一般物质生活水平较高、劳动者生活状况比以往有较大改善的情况，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受到怀疑就是“合乎逻辑”的结果了。他们在认识上的问题，既在于对西方国家劳动人民状况缺乏全面了解，又在于割裂了劳动者贫困问题、埋葬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因何落在无产阶级身上的问题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之间的联系。

还需说明，决定资本主义最终历史趋势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现时就在不断进行。因此，研究这个趋势，不仅对我们认识现存资本主义的未来命运，而且对我们认识现在西方乃至世界经济状况和国际局势，都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的科学论断

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最后，马克思有一大段总结性的论述。他指出，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进一步社会化，

生产资料日益转化为社会使用的公共的生产资料，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性质，随着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剥削程度不断加深，工人阶段的反抗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②

这是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由发生到发展的大量实际材料为根据，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本性、运行机制、固有矛盾，得出的关于这一生产关系最终历史命运的结论。在这里，马克思紧紧抓住的，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就是通常说的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历史上分散的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转变，是在生产力自身发展已经酝酿着这种转变的条件下，借助于资本关系开始实现的。在这个转变的基础上，“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③而一旦资本关系成为社会化大生产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它就达到完成其历史任务和丧失了存在理由该进博物馆的地步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揭示的历史的辩证法。

对马克思的论断提出责难的人，首先是把马克思关于“丧钟就要响了”的话，说成是他认为资本主义在当时就面临全面崩溃的结论。实际上，马克思的话固然与他对当时历史形势的估计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在《资本论》中是运用逻辑的研究方法，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因而他的论断是“管”整个资本主义时代的。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用的研究方法是逻辑方法。他从解剖商品这个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形态开始，一步一步地阐明围绕剩余价值这个中心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环节上展开的经济关系，同时从

“细胞”内部矛盾的发展，揭示出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必然走向灭亡的进程。《资本论》所展示的，是纯粹形态上的资本主义经济有机体。这和医学上研究人体从解剖细胞开始，一方面揭示由细胞组成的各个器官、系统的机理和功能，另一方面从细胞内部矛盾的展开，揭示由细胞发育为人体、人从幼年到青年到老年和死亡的生理进程，在道理上是相通的。

恩格斯在论述马克思所运用的方法时指出：在这里，“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④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逻辑研究方式和历史研究方式的联系和区别，使我们更加明白：马克思阐述的理论逻辑和历史的发展进程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但《资本论》又不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书。他不是描述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的具休进程，而是从实际出发，从现象到本质，撇开“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抓住了历史的必然性和总趋势。因此，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它的基本性质和运行轨道不会改变，它的发展趋势和最终历史命运也不会改变，马克思的论断就不会过时。

以上所述，并不等于说马克思没有提出在他的时代资本主义已成为生产力桎梏的思想。如果不是实际情况已是如此和马克思以其深刻的洞察力看到这一点，他就不会写出《资本论》并作出上述科学论断了。当时，以1825年英国爆发经济危机为标志，资本主义经济已发展到成熟阶段（虽然现在看来是它在自由竞争阶段的成熟），资本主义的矛盾已充分展开和显露，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据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象一个巫师那样不能再支配自己

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障碍”。^⑤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宣言》中论述了1848年欧洲革命形势，作出了“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而它“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⑥的判断。但是，1848年的欧洲革命失败了，到了1850年革命高潮再起的希望也已消失。恩格斯后来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指的就是这段历史。此后，马克思重新研究了欧洲经济发展状况，认为资本主义尚有能力强过危机，而无产阶级尚未成熟，还需要经过十几年至几十年斗争锻炼时间。在这种革命处于低潮情况下，马克思“重新回到书房”，集中精力研究政治经济学，到1867年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⑦在40年代对革命形势的估计“曾经错了”之后，马克思并没有修改《宣言》中关于资本关系已成为生产力发展障碍的思想，反而在60年代出版《资本论》，公布了更加成熟的科学结论。这就进一步说明，马克思关于“一旦”发展到与社会化大生产不能相容的地步，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响了的结论，与其说是针对当时历史状况的，不如说是揭示历史发展的最终必然趋势的，是“管”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史的。

以后的历史说明了什么

《资本论》第一卷问世后的历史不是推翻了而是证实了马克思的结论。就最重要的事件而言，这种证实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曲折中前进，一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经历了两次较大的变化。

先说第一方面。19世纪70年代，发生了巴黎公社革命。公社存在了70天，失败了。但这场革命正是资本主义矛盾激化的产物，公社作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尝试，其原则是永存的。20世纪初期，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它在70多年的发展中显示出的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越性，它从打破资本主义一统天下到推动世界格局的变动，它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留下的巨大痕迹，是不可能一笔抹煞掉的。正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二次大战后出现了中国等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谁要想证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矛盾、历史趋势以及它如何孕育了新社会从中产生的条件的理论不对，除非他能证明这些亿万人参加、在世界大片土地上取得巨大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毫无历史理由和科学根据的。

诚然，社会主义革命没有首先在西方国家发生，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历史的倒退，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革命几度处于低潮。这些情况的出现，就其本身所处历史条件和有一个演变过程而言，都带有一定的必然性；但相对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而言，何时何地出现何种正方向或负方向的变化，又是历史长河中的偶然事件。历史的具体形式和相对于总趋势而言的偶然性是可变的，历史总趋势本身则不会变。

从另一方面证实马克思的结论的是资本主义自身发生的变化，这就是从自由竞争到垄断和在垄断阶段实行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的变化。

现在看来，自由竞争的资本关系与在它之下繁盛起来的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激化时，资本主义实际上面临两条出路。一条是被社会主义代替，这是从根本上解决矛盾的出路。只是由于历史条件不成熟，当时在欧美没有发生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另一条是走向垄断资本主义，这是暂时缓和矛盾，使资本主义得以继续维持一段历史时期的道路。

在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和垄断统治确立初期，新的资本关系，加快了生产集中和大规模企业的发展，使生产方式革新，管理向科学化发展，促进了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但是垄断不仅没有消除基本矛盾，而且一方面由于社会化大生产提高到新水平，另一方面资本更加集中在极少数垄断

资本家手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更高层次上展开。由此带来的破坏力，也比自由竞争时期大得多。这一点，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空前严重的30年代大危机中，表现得非常充分。

正是在这充分证明私人资本主义关系与社会化大生产不相容达到顶端的大危机爆发前后，产生了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经济学，出现了实行国家干预经济大规模试验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新政”。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家干预经济在西方国家经常化、系统化、制度化了。这些表明，私人垄断资本关系在成为生产力桎梏的时候，也面临两种选择，要么被炸毁即被社会主义取代，要么寻求生路走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现在，我们又看到，西方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越过它在战后经历的二十几年的“黄金时期”，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也走起下坡路来了。与此同时，随着生产的社会化向国际化发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范围也向国际上扩展。采取诸如成立国际经济组织、进行国际谈判、首脑会晤、组织经济共同体或协作区等等形式的由国家出面的国际垄断调节，正逐步发展起来。

资本主义关系自身发生上述变化，同样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产物，因而也是资本主义合乎规律的发展。这种规律，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就已被揭示出来。恩格斯曾作过这样精辟的概括：“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抗，要求承认它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必要性，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一切可能的限度内，愈来愈把生产力当作做社会生产力看待。”^⑥这就是资本关系自身发生变化的根源和实质。每一次局部质变，都在高一层次上把生产力当做社会生产力看待，因而为生产力发展提供了新的余地，然后在更大范围和规模上与上了“新台阶”的大生产发生剧烈冲突。这样，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与资本关系自身变化形成的阶段相适

应，表现为相对缓和、激化、再相对缓和、再激化的过程。

纵观资本主义发展史，由采取上述运动方式的基本矛盾决定，资本主义在其历史总趋势下走向灭亡，并不是在全世界整块地走完一次性发展阶段，到达某一极限时寿终正寝，而是在它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矛盾激化时，都有可能某个或某几个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而革命是否成功和能否坚持到底还取决于当时当地的主客观条件。这就是说，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既可以发生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矛盾激化时期（虽然19世纪没有发生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可以发生在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腐朽性垂死性加深加剧之时（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中国等若干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在现时和今后国家垄断或可能形成气候的超国家垄断调节再也驾驭不了更高层次社会化大生产时，既可以发生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先发生在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薄弱环节的落后国家。这样，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走向灭亡的过程，就可能是一个长时期的历史过程，是整整一个时代。时代的总趋势是社会主义一部分一部分地取代资本主义，但其中会包含革命高潮和低潮交替，甚至出现有的国家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了一段又向资本主义倒退等迂回曲折现象。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与“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即“资本主义私有制”不相容性。

这个矛盾的动态表现的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造成这种趋势的，是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形成促使生产效率提高和规模扩大的企业内在动力，由普遍竞争形成的企业外部压力。同时，社会化大生产各部门结构平衡与不平衡交替，使整体生产似乎具有一种惯性力；生产规模越

大，其进一步扩张的要求和能力越强，这种惯性力就越大。

从生产过程看，这种生产扩大趋势与作为生产目的价值增殖必然发生冲突。对这一矛盾，马克思是通过揭示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来分析的。有的学者用统计资料来否定这个规律的存在，殊不知这是集中反映资本主义积累中深刻矛盾的、作为一种趋势起强制贯彻作用的规律，而不是描述一个经济变量变动常规的、可以用统计资料直接证明或推翻的定律。

从生产与流通、分配、消费间的关系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又表现为商品生产的扩大受到市场实现条件的限制。这种限制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是生产部门间比例的破坏，其直接后果是有的部门产品过剩，销不出去，情况严重时造成紊乱和危机。造成比例破坏的原因，在于企业盲目生产形成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企业不知道市场需求量，知不知道部门应保持什么比例。问题的症结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这种所有制关系下，即使知道市场需求，企业也要执行资本增殖的命令，为争夺市场份额相互间展开激烈竞争。

第二，是社会消费力对市场实现条件的限制。其主要表现是相对于生产扩大和资本按一定比例增殖的需要，作为消费者大多数的劳动者的消费力始终被限制在狭小范围。实行这种限制的，是资本主义对抗性的分配关系。这种限制的后果，首先使生产消费资料的第Ⅱ部类、进而使生产生产资料的第Ⅰ部类销售困难。

从市场供求看，部门间比例破坏造成结构性商品供给过剩，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形成总量供给过剩，后者表现为周期性加重或（和）长期性严重的商品过剩。与此相适应并相互推动加剧的有结构性、周期性、长期性“三重”相对人口过剩（“三重失业”）和相

应的“三重”资本过剩。当它们积累到相当程度时，就发生结构性危机、周期性危机和长期性停滞的三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当这“三重”危机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对资本主义就特别危险。而在危机没有提供资本关系大调整或社会主义革命契机的情况下，通过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可以暂时恢复比例和平衡，矛盾暂时得到解决。在这种意义上，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保持运行的一种特殊调节手段，虽然这是一种灾难性的和仿佛从外部强加于这个社会的手段。

从社会阶级关系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面对当代一些新情况和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的争议，强调以下几点有重要意义。第一，决定人们阶级地位的，最根本的是他们和生产资料的关系。无产阶级即雇佣劳动者的特点，就在于他们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以此为据，当代西方国家雇佣劳动者数量及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都比过去明显增大了。以此来衡量，主要以收入划分提出的“中产阶级”概念，是用以抹煞两大阶级对立的模糊概念。第二，现在无产阶级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确实比19世纪有显著改善。但是这并没有根本改变这个阶级受剥削和奴役的地位。即就无产阶级贫困问题而言，有学者认为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只有相对贫困即贫富悬殊，再没有绝对贫困。这本来在逻辑上就是说不通的。没有绝对意义上的贫困，哪来贫富悬殊，财富和收入差距岂不应称为“小富大富悬殊”？从实际情况看，美国现有3300多万、占人口七分之一的官方认定的穷人，而官方划出的贫困线以收入只够买生活必需商品和劳务的一半为准。这些穷人生活艰难，忍饥挨饿，缺衣少药，还有数以百万计的白天沿路乞讨、夜里露宿街头的流浪者。这些算不算绝对意义上的贫困？象美国这样发达富有的国家，竟有这么多这样穷的穷人，除了说明资本主义

就是这样一个制度，其他任何解释能自圆其说吗？第三，资本主义经济是不稳定的经济，劳动者的地位决定了他们在“好天气”下的“好生活”是得不到保障的。失业、周期性危机、长期性停滞等对他们生存的威胁总象幽灵一样跟随他们。一旦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加剧，他们是首要的受害者，这些威胁就变为现实的困境。第四，埋葬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之所以落在无产阶级身上，并不仅仅因为它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受苦的阶级，而首先因为它是与社会大生产相联系的最富有革命彻底性的阶级。把基本矛盾和阶级矛盾、革命的客观形势和主观条件联系起来看问题，现在仍然可以说，资本主义的命运，取决于它渡过危机的能力和无产阶级的成熟程度。

国家干预起什么作用

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告诉我们，国家干预经济增强了资本主义缓和它的基本矛盾和渡过危机的能力，但同时又埋下了使基本矛盾再激化和使对付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弱的“祸根”。

在以往的资本关系变化中，垄断统治的确立虽然划出了一个新阶段，但垄断和自由竞争对于基本矛盾仍属于同一层次。它们都不具备代表社会的资格，不直接对宏观经济发生作用。能够以社会名义在资本关系范围内把生产力当社会生产力看待，在宏观经济调节中有所作为的，是资产阶级的国家。

国家直接参与经济活动起了增强私人资本的力量、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例如，运用财政手段集中的巨额资本，兴办垄断公司共同需要的象公路、铁路、供电、邮政、科研、教育等“公用”事业。又如，通过税收把一部分社会购买力集中在国家手中，又通过政府采购为私人公司提供稳定的大市场，等等。而国家干预经济更重要的作用，是调节整个社会经济。由于社会经济的常态是商品、资本和劳动人口相对过剩，国家调

节的主要侧面是刺激投资和消费，以减缓危机。有时采取措施抑制投资、消费，其目的也在缓和“过热”带来的矛盾。

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主要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计划调节、其他立法行政措施等。财政减收增支，用以刺激消费和投资；增税节支，则可以抑制经济。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调节货币供应量，通过由中央银行进行债券买卖、调节利率、法定银行准备金率等，为刺激经济增加货币供应量，或为抑制经济减少货币供应量。如果说，财政、货币政策主要用于从总量上调节供求关系的话，那么，实行某种程度的计划调节，则包含减轻部门间比例破坏的企图。此外，国家还采取社会福利政策、调节劳资关系政策、保护竞争抑制过份垄断政策、乃至对银行存款保险、鼓励加速折旧等等，总之是全面系统地干预经济过程。

国家干预经济的整套措施和由此形成的当代资本主义新的宏观经济体制，在缓和驾驭资本主义经济矛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种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在微观上的动力、活力、效率等得以发挥，由此促进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阶级关系和社会面貌发展了新变化。但是，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盛世”过去了，出现了比前一个时期更长、至今还看不到摆脱希望的经济相对停滞、缓慢增长的局面。究其原因，就在于国家干预不仅没有解决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矛盾，而且自身陷入困境。

首先，国家干预经济既没有消灭大生产，又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当然不能消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国家干预的作用，充其量只是缓和基本矛盾引起的严重后果。换言之，国家干预这剂药方治不了资本主义病，只是起缓解症状的作用。因此，国家干预经济的作用一开始就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例如，经济不景气严重时，货币供应量再增加，利率降得再低，投资和消费也可能刺

激不起来，或者刺激效果甚微；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矛盾达到尖锐程度，政府采购增加得再多也补不了这中间的空缺；政府经济计划或者只是行情预测，或者只被看作“天气预报”，或者只能起某种诱导作用，说到底不能对私人资本有约束力；劳动者生活艰难和贫困现象大量存在，政府的作为充其量是使部分穷人得到救济，而且这种救济的效用，正象圣诞节给流浪者发一条睡袋，却解除不了他们在街头露天度过寒夜的痛苦一样。总之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经历增长后出现停滞，高涨后仍有危机，失业、贫困、阶级矛盾依然存在，社会问题成堆，都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存在并在不断积累的证明。

其次，随着国家干预的发展，一方面社会化大生产被提高到新水平，另一方面私人垄断资本的力量进一步增强，财富愈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更高的层次上展开。资本主义生产力现在发展到只有实行国家干预才能驾驭的程度，一旦它再发展到着手突破这种新型资本关系的外壳，其后果的严重性就不是自由竞争、一般垄断时期所能比拟的。我们从70年代初以后西方国家发生的经济危机都比这以前深刻、严重，是可以看出这种征兆的。

第三，国家干预造成或加剧的财政赤字、国债、通货膨胀等等，现在使国家干预陷入了困境。我们知道，政府刺激投资和消费的财政政策是减收增支，这当然会造成和加剧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的赤字。有了赤字就要借国债，国债累计过高每年还本付息开支不断增长，于是陷入高财政赤字——高国债——高财政赤字的恶性循环。刺激投资和消费的货币政策是增加货币供应量，货币量超过流通中所需的量势必加剧通货膨胀。在美国，70年代持续的高通货膨胀率，迫使政府在80年代压住货币量而更多地依赖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美国人把今天的高财政赤字和高国债归咎于在80年代执政8年的里根，

实在是有些冤枉这位总统。

有了财政赤字、高国债怎么办？除了绝不可为的赖帐，第二个办法是刺激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了，政府收入就会增加，就有钱还债了。但是，要刺激经济就要减税、增加政府开支，这又会增大财政赤字。信奉这种供给经济学的里根就是这样被“逼”得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敢花钱的总统”的。还有第三个办法，就是政府实行增收节支。按照经济学常识，这是治本的办法，但要真这样做，按照国家干预下资本主义经济常识，势必引起投资、消费萎缩，失业增加，商品滞销，从而诱发或加重经济衰退，加剧阶级矛盾和社会动荡。在美国，里根任总统时，国会就通过减少财政赤字法案，没有效果。布什1990年与国会打了一场预算战，通过了一个一面增税一面减少政府开支的5年内消除财政赤字法案，象是要采取治本的办法了。

结果如何呢？“5年计划”第一财政年，财政赤字不仅没减少，反而达到历史最高记录的近2700亿美元。同时使本已大为减弱政府干预对经济的刺激力变得更弱，成为1990年发生的经济衰退迟迟不得解脱的重要原因。

为治财政赤字而再刺激经济的办法，结果是财政赤字再增加；想用治本的办法，结果是已“习惯”于依赖政府干预刺激才能增长的经济又难以为继。在政府陷入这种对经济“刺激不得了，不刺激也不得了”的两难境地的同时，私人垄断公司也面临偿债难，并因此使大批银行因收不回贷款本息而濒临破产，还有劳动者因长年举债消费和经济衰退而遇到维持消费和偿还债务的两难选择。各种矛盾加在一起，使得一位企业家发出惊人之语：美国需要来一次大萧条，才能使经济回到“正常秩序”。请注意他用了“需要”这个词，这可以说是只有深通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奥妙的人才说得出的警句。

我们主要以美国为例说明的国家干预经济陷入两难再次证明，无论资产阶级在多大

范围内把生产力当社会生产力看待，只要还是在资本关系限度之内，矛盾就不可能得到解决。据此，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家们应该懂得，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没有，也不可能因别的国家发生什么变化而解除被推翻和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威胁，因为这种威胁主要不是来自他们社会的外部，而是源于其内部、靠自身不可解决的矛盾。就说实行过社会主义又倒退的国家吧，为什么走变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私有制的路如此困难重重，步履蹒跚？原因并不复杂。要使本性只适于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社会化大生产，重新被塞进本不相容的资本主义外壳，怎会不引起混乱、震荡和社会灾难？即使塞进去了，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原有的矛盾和冲突也发生了，而且仍然是在资本关系内不可解决的矛盾。

还是恩格斯说得好：“这种解决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

（上接79页）计划生育是贫困地区经济开发工作不可分割的内容，把计划生育列为扶贫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干部包干扶贫责任制的重要内容，把完成计划目标任务作为扶贫达标的一项重要指标。凡是计划生育工作未达标的，不能作为扶贫工作的先进单位。

（二）各地都应按照中央的要求，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计划生育与扶贫挂钩的具体政策，使计划生育政策和扶贫政策相互配套，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如对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的贫困户，特别是独生子女户和结扎户，要给予优惠和奖励，应在扶贫贷款发放、扶贫项目安排、农用物质供应、致富技术培训、剩余劳动力就业等方面，在同条件下给予优先或优惠。

（三）制定脱贫计划和增产、增收项目与落实计划生育和避孕节育措施相结合。

在照顾安排二胎生育指标时，要把家庭收入情况作为重要条件。符合二胎生育条件的家庭，在达到温饱标准之后，方可安排生育；未解决温饱的户，待人均生活水平达到温饱线以上后，才安排生育二胎。

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社会管理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①这指明了：要根治人类社会资本主义阶段的一切弊端，只有以社会主义取而代之。

注释：

①《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5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1—832页。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88—289页。

④《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页。

⑤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6—257、285页。

⑦关于这段历史，参见于云本：《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历史发展》第2章，求是出版社1984年版。

⑧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34、437页。

（责任编辑 程镇岳）

（四）对超生贫困户的扶持，要有限制他们再次超生的措施。

对确定为扶贫对象前超生的贫困户，必须要求他们按期缴纳超生罚款；对已列为扶贫对象后又超生的贫困户，应进行认真教育，终止其在扶贫上的优惠，在其采取了必要的节育措施后才能扶持，坚决杜绝一边超生，一边救济，一边扶贫的现象。

（五）各级政府加强领导，做好协调工作。

各级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尽量吸收计划生育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把计划生育工作摆在与经济开发同等重要的地位；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也吸收扶贫工作负责人参加，以便共同研究扶贫工作和计划生育工作，密切配合，齐抓共管。

（六）不断总结和推广扶贫与计划生育结合的新鲜经验，把贫困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注释：

①《人民日报》1989年11月2日第三版。

②③李绍先：《控制人口增长，努力脱贫致富》，《人口动态》，1990年第5期第2页。

（责任编辑 徐云鹏）